

# 胸中有道义 笔底藏乾坤

## ——龙长吟《治守之道》研讨会述要

刘 哲

(毛泽东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13)

2016年12月3日,由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作家研究中心”主办的龙长吟文学评论集《治守之道: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以下简称《治守之道》)研讨会在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举行。湖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刘克邦,湖南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汤建军,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怀化学院党委书记谭伟平,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陈善君,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执行主编万莲姣,湖南省作家协会创研室主任容美霞,湖南省作家协会组联室主任娄成,毛泽东文学院副院长、湖南作家网主编刘哲,湖南省知名评论家罗宗宇、聂茂、禹建湘、肖百容、吴投文、任美衡、许艳文、罗如春、龙永干、黄声波、晏杰雄,以及《湖南文学》编辑刘威等出席会议,《湖南日报》《长沙晚报》等多家媒体记者、中南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点教师及研究生等40余人列席了会议,湖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岳凯华做了书面发言。研讨会由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南作家研究中心主任、中南大学教授欧阳友权主持。这是近年来湖南文学界首次为评论家专著举办的研讨会。

《治守之道》于2015年10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7.5万字,是一部连通国运与文运、借文学批评反腐倡廉、弘道明德的担当之作,一部为官场文学正名的专门性著作,一部评论与研究湖南本土作家作品的同步性著作。书中评论的对象全是湖南省作家近20多年来的作品,是一部现实性与本土性特点十分突出的文学批评专著。

会上,数十位专家、学者对《治守之道》展开了

热烈的研讨,充分肯定了其学术价值和理论贡献。

### 一 《治守之道》著者是一位真正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评论家

龙长吟,本名龙长顺,湖南邵东人,194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曾任湖南省作协理事、创研室主任,湖南省文艺理论学会、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第二届荣誉主席。龙长吟先生是一位真正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评论家。1965年上半年全国批判电影《早春二月》时,他在湖南师院中文系读大二,曾奋笔书写了一篇反批判的万字长文《论“早春二月”主题的积极意义》,1977年在《湘潭大学学报》发表《批判“四人帮”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污蔑》一文,最早提出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平反。这部他退休后出版的系统研究当代官场文学的《治守之道》,第一个从理论上为官场文学正名。此外,他还撰写了全国第一部当代民族文学理论专著《民族文学学论纲》,1999年初夏举行了湖南“60年代生作家”座谈会,也是他第一个按年代划分中国当代作家群,尔后才有60后、70后、80后的说辞。1978年开始,他在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三个方向上发力,现有专著6部,169.5万字;合著11部,执笔90万字;另有未入集的论文约80万字,其中论湖南作家作品文字约占80%。放眼全国、宣传本土,是龙氏文学评论的一贯特色。刘起林教授评论龙长吟学术研究的专论《学术慧眼与人文热情的有机融合》,入选了《中国九五科学研究成果选》社会科学卷。

衡文必论人。万莲姣说,作为与共和国一道成

长的学者,龙长吟以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秉承湖湘文化或湖湘学派仁人贤士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人文情怀,将学术眼光投向湖湘土生土长的政坛文学领域,不畏浮云,安守清贫,穷究当代湘地政坛文学何所由来,诚如该书“自序”言,“殚精竭虑,弘道明德”,一个已然融入研究对象甚至被研究对象对象化的勤于思考的湖湘读书人样子活灵活现,一个勤勉笔耕、敬业爱国的中式学人形象跃然纸上。

陈善君认为,龙长吟是一个专职的批评家,半个世纪的批评史。在他的笔触中,情中聚理,情中见专,体现着一位老批评家的眼光和视野。

晏杰雄甚至建议龙老师写一部《一个人的湖南文学史》,因为龙老师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当代湖南文学史,他是半个世纪来是湖南本土文学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熟知湖南当代文学进程中关节点的情况和重要作家作品的情况,他的个体文学史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湖南非常稀缺有这样文学史经历的批评家。

龙永干称龙长吟是湖湘文学的卓识者、宽厚的仁爱者、批评之美的追求者;欧阳友权指出,龙长吟先生一辈子只做文学评论这一件事情,他对文学评论事业的专注与热爱,值得每位青年文学评论家学习。

## 二 《治守之道》字含道义,笔藏乾坤

刘克邦认为《治守之道》是文学与人学、艺术与思想融为一体、交相辉映的创新之作。龙长吟虽已告老闲休,但眼观天下,胸怀大局,用笔、用心聚焦官场,直面政坛,从典型文本、典型人物和典型案例中,寻找与拷问政坛权力的运作,弘扬清廉与正义,披露贪腐与阴暗,并把脉问诊、对症下药,为当政者和决策层提供尽管只是只言片语的治守良方,也是一种担当。

汤建军特别指出“这是一部连通国运与文运的担当之作”,作为官员要守正道,要保持清正廉洁。龙老师书中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一部优秀的官场小说,就是一把反腐的利剑,一部沉重的社会档案,一篇现成的公车上书。官场小说如果只是歌功颂德,没有什么人去看,很难引起大众的共鸣。作为作家,也要守住正道,通过文艺创作弘扬正能量,宣传真善美。为官之道与创作之道,在为人民服务这点上是一致的。

容美霞非常认同汤先生的观点,肯定《治守之道》是一部肩负道义、笔藏乾坤的及时的书。她说,整部著作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发现,该书既把官场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放在整个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来审视,又充分关注社会现实,讨伐贪污腐败,高扬人间正气,笔下自有乾坤。龙老师做的这些研究从来没有向作协寻求任何支持。他是完全抛开了功利之心,抱着为湖南文学做实事的态度在做这项工作,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位肩头有责任、胸中有大义的有担当精神的一位学者。

刘哲指出:龙长吟先生以《治守之道》为杠杆,坚持真理,为文学写真伪,为历史辨曲直,为作家争地位,担当精神十分可贵;他努力将文学批评的“二等公民身份”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 三 《治守之道》的学术亮点与特色

许艳文把《治守之道》的特色归纳为四个中心词:系统,广博,深邃,缜密。从文本来看,其涉及到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军事学、伦理学、文学、美学、艺术学等多个领域,内涵丰富,信息量大;行文过程中,其饱含对国家、对苍生的忧患意识,人文情怀充溢于字里行间。

聂茂肯定了该书的“学理阐释”,认为:“作为一本扎实的文学评论专著”,“龙长吟不仅运用孟德斯鸠《社会契约论》中的观点,来论证中国权力运作的缺陷并为其寻找出路,同时还广泛运用社会关系学的原理来解释官场的权力制衡模式。”任美衡认为学理性还表现在概念界定的清晰,如:“官场小说,乃是以官员为主角,以权力运作为中心,描写官场生态、官运沉浮的社会人生小说之一种”,具有文学史意义,它将改变中国辞书以往对官场小说的语义解释。

肖百容肯定了《治守之道》的新发现,“只有把握住了复杂而又深刻的时代特征,我们才能给予当代小说以公正的评价。”由此他肯定了该书两个“发现”:“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发现了官场小说的最大意义”,“在时代的变化中发现了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转变,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新关系:‘以文资政、以政养文、文政协和’”,“展现了作者扎实的功力与学术的激情”,认为它是我们了解湖南官场小说、湖南官员创作以及湖湘文化魅力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岳凯华认为龙长吟“在当代湖南官场小说作家的创作基础上,把他们没有用文字明确写出的具体途径与办法,用精炼的语言和独到的文字提炼表达出来,希望为高层领导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参考”,“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尤其是情节场面之中加以分析,将作者潜藏的意念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多次由小说的现象描写归结到权力体制问题,由此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龙长吟眼中的政坛也是一片文学的园地,它润育着越来越多的醒世之作,人间正气潜藏其中。这一股静默的力量,等着大家用心去发掘。”

罗宗宇认为,《治守之道》是一部有责任担当和现实意义的文学评论作品,也是一部有理论深度和个人识见的创新之作。一是以“政坛文学”这一命名和范畴将“官场文学”和“官员创作”统括起来,对当代湖南文学创作也是当前全国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现象进行考察,体现了一种理论勇气和新见。二是对一些固有判断进行了突破,如“优秀的官场小说并非通俗小说,而是一种成熟的纯文学文本”,对官场文学的批判性品格给予了肯定;同时从新角度如从文化角度来考察官场小说的繁荣的原因;从全国的视野对当代湖南政坛文学创作进行考察,以“重镇与先锋”来定位当代湖南官场文学在全国的文学地位等,都显示了理论观察和认识的深度。三是宠观把握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如第1章对官场小说的定义和品格的思考,对官场小说的整体把握,第2到10章选取若干个案研究,在论析中特别注意对现象或问题进行历史梳理,具有文学史的脉络和眼光。

吴投文认为《治守之道》是一部富有新意而自成体系的专著,视野开阔,新见迭出,在近年来的湖湘文学研究中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一是总体把握与个案研究相结合;二是理论概括与文本细读相结合;三是重点突出与文体兼顾相结合;四是历史透视与现实意义相结合。该书对湖南近20年以来政坛文学的总体定位、发展历程和创作特色都概括得相当到位,在个案研究上更显深度,一方面在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的总体性视野中观察湖南政坛文学的创作特色,另一方面在一种综合性的视野中把握湖南政坛文学在中国当代官场小说中的地位,符合湖南文学的实际情形。

罗如春认为《治守之道》运用比较视野,从宏

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研究对象,系统完备,结构严整,在有限的空间中把问题说清说透。

黄声波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官场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在图书市场持续流行和火爆,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如以王跃文的《国画》、阎真《沧浪之水》等,其实际影响要远高于同时代一些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但遗憾的是,由于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原因,其创作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湖南是官场小说创作的重镇,人称官场小说创作的“半壁江山”,龙长吟先生《治守之道》一书,开湖南当代官场小说创作系统研究之先河,把王跃文、肖仁福等人的官场小说提升到当代湖南文学品牌的高度,充分肯定其时代价值和艺术成就,其表现出来的学术眼光和理论勇气,令人景仰。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治守之道》从为政之本、为官之道出发对政坛文学进行研究评论,基本诉求与习近平总书记“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精神高度吻合。龙长吟一方面沿着作家的创作路径,用文学史眼光为作家作品定位,挖掘当代官场小说的思想灵魂和审美属性,论定官场文学已属成熟的、重要的社会主义纯文学的新文体,另一方面也明确地指出了官场文学作品应该把握的分寸,对官场小说和官员创作中滥竽充数的赝品、次品,做了严正的批判。作者以一个评论家的冷静思考,为官场小说的走向把脉。《治守之道》在评说作家的同时,还及时表达了批评家的文学观念、美学见解、政治理想和历史思考时,并对文化实业学、文化产业学的建设问题,以及文学与政治由从属于关系转变为“文政协和”的新型关系等前沿问题,做了新颖的论述,其意义与价值不囿于文学本身。

#### 四 《治守之道》著者的评论特色与风格

谭伟平认为,《治守之道》是一部为官场小说正名的作品,知人论文,力求公允;涤浊扬清,昌明辨正;借道究理,返璞归真;语言晓畅而有诗意,可读性强。

禹建湘说,龙长吟先生以独到的文学批评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批评谱系、批评话语和美学原则,坚守着文学批评的尊严和独立价值,自觉地承担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导航者”和“守夜人”。在当今人情

批评、圈子批评、酷评、媚评、空头批评、好话主义日器尘上、学院式批评大行其道的批评背景下,龙长吟先生的文学批评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独特的贡献,对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的精神形象和建设中国化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其具体表现为四个特色:坚持文学与文化的先进方向,占领文学评论思想的制高点,对当代文学进行正确的认识、把握和评价;把文学批评放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在比较中把握文学的发展走向,他的批评注重对文学作品历史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感悟和阐发;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坚持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平等对话;强化和张扬主体意识,实现对文学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也是龙长吟文学批评思想的灵魂。

晏杰雄认为龙长吟的批评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批评传统,即一种务实的现实主义批评传统,他是把现实经验与文学文本直接揉合在一起的一种批评,把现实改造力量倾注在批评写作之中的批评;文风朴素,却切实有效,不花哨,句句有所指,能够击中作家和现实生活中的痛处。

万莲姣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寂寞的事业,它必须依托作家作品,实现文化互动再造。在作家/文本和批评者(读者)的关系场中,批评发散着浓厚的第一读者的文学生产现场气息。《治守之道》篇篇如是,章章如此,字里行间,莫不如是。

卓今说,龙长吟的批评为新生的青年文艺批评家树立了好的榜样。当下,以西方文论为脚手架的批评模式被推倒了,我们如何展开批评?一是要有问题意识,二是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深入文本与跳出文本、规律研究与个案研究、西方资源与本土资源、缘情与缘道的关系。这些方面,《治守之道》都有所探索,有成功,也有尚不尽如人意之处。

任美衡说,作为一个几乎与湖南当代文学同行的老批评家,龙长吟先生为湖南文学之发展作了突出的贡献,今天所捧出的文学评论集《治守之道》仍然显示着其锐气、客观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说来,一是关注文学热点。该著不但精心地雕刻出了湖南官场文学的主题形象、特色与诗学,而且还从正面切入文学官场的逻辑、内在结构与发展方向,并力图用文本细读重新建构政治与艺术的本体情怀。二是直面文学难点。具象化现实体制的官员形象并予以辩证的评价,突破“定性”之难;化解本

土、当代与审美之评价和世界、历史与人文评价之矛盾、错位并将之创造性地结合;从而由批评之技通向批评之道。三是还原文学奇点。作者力图回到现场,剖解那些人事情物;回到感觉,从印象出发,将之作为评论的基本要求、基本素质与基本标准;回到个体自我,形成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生动的龙氏批评伦理学。

《治守之道》作者龙长吟也向与会者坦陈写作该书的专业追求:一是坚持文学史眼光和广阔的视野;二是深入挖掘作家作品的思想灵魂和审美属性;三是唯真、唯实、唯理,努力追求学理性;四是坚持作品本体、文学本位,不搞不看作品任意发挥的盲评,不搞痛快淋漓骂倒一切的酷评,不搞玩弄新名词新概念、故弄玄虚的妄评;五是地方评论家要坚持本土评论,努力让墙内开花墙内外都香。

## 五 《治守之道》的不足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者们也坦诚地指出了《治守之道》的一些不足之处。

刘克邦等几位专家认为,《治守之道》虽然在引论中详细而严厉地批评了官场小说创作中的种种弊端,但一接触到具体的作家,对其缺失都是点到为止,显得批评虽厚重但不犀利,其所以不犀利,可能是他为人文太善良了的缘故。罗如春指出,如果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距离太近,批评品格的独立性便难以保证;也许正是与批评对象之间距离太近的缘故,《治守之道》批评的独立性有所不足。

万莲姣说,《治守之道》有些章节读来荡气回肠,但有些地方,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湖湘文化只讲经世致用的权谋思维和战斗思维,尚未摆脱治乱循环的传统谏言策士路径依赖;其对官(公职)的认识较为陈旧,未能达到人类世界政治文明的最新层次。从这个角度看,龙著对官员的写作评价偏高。

还有学者则认为,《治守之道》选取作家作品有点杂,如对王跃文《漫水》和余艳《杨开慧》的评论文章就不适合编入著作中。

同时,大家也一致认为,尽管《治守之道》存在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不会影响其作为一部创新之作的总体价值。